

---

# 西方汉学研究视域下的成都形象综述

胡文婷

**【摘要】**成都城市历史悠久，亦一直是西方汉学重点研究的中国城市之一。成都进入西方人视野的时间最早可追溯至 14 世纪的《马克·波罗游记》。随后，陆续入蜀的西人不断用其笔触丰满着西人视野中的锦官城形象。至今，当代西方汉学家仍有不少将其研究目光投注中国西南地区，聚焦成都的社会与文化，其构建的成都形象不仅具备时代特征，亦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嬗变。

**【关键词】**成都文化 形象构建 西方汉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139(2018)11-0025-7

成都作为蜀地中心，凭借其独特的文化气质及城市精神使得“锦官城”的形象一直活跃在中国本土文人及学者的作品中。历史上入蜀的西人络绎不绝，从最早的旅行家到当代的专业汉学家，他们对成都的描述及研究建构了西方视野中的成都形象。

本文将回顾早期西方人对成都的介绍与叙述，厘清成都进入西方视野的历史，并以当代西方汉学家对成都的研究为中心，包括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系统把握西方汉学史中的成都形象的阶段性特征，以探索其形象中文化内涵的嬗变，从而为推动成都文化的海外传播提供借鉴。

## 一、西方汉学史中成都形象的早期构建

入蜀并留下著述的第一位西方人为意大利商人、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他曾在其游记中记载“穿山越岭，走过二十个驿站之后，达到了蛮子范围以内的一个平川，中有一区域名新定府(Sin-ding-fu)，它的省治系一壮丽的大城，也应用同一个名称。”这里的“新定”即“成都”，是为成都的第一次“西方书写”。马可·波罗虽对成都走马观花，但却抓住了成都的主要特点，他曾对锦江如此描述，“有许多大川河发源于远处的山上，由不同方向围绕并经过此城，供给它以所需的水量，此等川河有些宽至半哩，有些宽二百步，都很深。城内有一座大桥跨过其中的一河，从桥的一端到他端，两边各有大理石柱一排，支持桥头顶，顶系木制，饰以红色的图画，并覆以瓦。”另外，马可·波罗还关注到河道两侧熙攘的人群和商业，他将成都直接比拟为他的家乡“水城”——威尼斯，虽两座城市的不同之处更多，但这种比拟却可以有效地帮助西方人在脑海中迅速勾勒东方“成都”的概貌。故而，流水、小桥和商业，成为西方人对于“成都”的最初想象。

在马可·波罗之后，又一意大利人途径蜀地，名曰真福和德理(Bi. Odoric of Pordenone, 又名鄂多立克, 1265-1331)，方济各会传教士。他曾在 1323 年从广州入华传教，并于 1328 年从陆路返欧，途径四川。在他的游记中记录“余续曰多站，后抵一省，名加散，为胜省之一。幅员甚广，纵横皆数千里，属城彼此相距能出此而望彼，米粮果木极多（板栗尤多），土产大黄，其价甚贱，每驼只价各罗索六枚，此大汗十二省之一也。”郭栋臣在注释《真福和德里传》时，称“元初，陕西四川暨甘肃一带，统属加散，加散即古之长安，今之西安府也，陕西多大黄，四川多板栗，以此证之。”可以看出，真福和德理对四川的描述十分简略，甚至未具体提及成都，没有马可·波罗眼中的“水乡”景色，仅唐人口众多、物产丰饶之印象。

无论是马可·波罗，还是真福和德理，他们对四川及成都的描述均属于汉学史中的“游记汉学阶段”。<sup>1</sup>鉴于游历者身份，他

---

<sup>1</sup>基金项目 2018 年度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西方汉学家与成都文化的海外传播研究”(项目编号: 2018L41)阶段性成果。

---

们拥有空间移动的经验及地理记忆，却因未来得及深入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与历史，导致其描述多为浮光掠影之谈，且多着眼于物质器物层面。他们的游记，虽不乏游历者真实的观感，却也因为掺杂了较多的个人的选择与期望，从而构建出具有鲜明个人特质却又模糊的“成都形象”。

明清时期，以利玛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再次踏上华土，不同于之前西方人的走马观花，这批传教士大多在中国驻留或生活，在实际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他们撰写了许多书信、报告和著作，记录彼时中国的方方面面，涉及地理、风俗、文化、社会制度、宗教等，开始在精神层面构建中国形象，其中不乏对成都的记录。17 世纪，居住在成都的西方人有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类思 (Ludovico Buglio, 1606-1682)、葡萄牙耶稣会士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aes, 1609-1677) 利、安二人在川生活长达 7 年，活动范围遍及成都、绵竹、绵阳等地，交游网络包括士绅阶层及平民。利类思在入蜀前，对四川的印象停留在“(它是) 中国较大省份之一，毗邻西藏，距离南京城很远，需要水路过去，历时三个月”，而在生活多年之后，他们对四川及成都的认识则更为丰富。安文思曾在《中国新史》中记载四川的土司制度，“在这个帝国的城镇中，有一些在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省，我认为它们不向皇帝纳贡，也不归顺他，而是由特别独立的王公统治。这些城镇大部分有高山悬崖环绕，好像是大自然格外赐予它们的防御工事。山岭之间是几天旅程的田地和平原，从那里可以看见第一等和第二等的城市及许多乡镇村落。中国人把这些王公叫做土司 (Tu Su)，即土官 (Tu Quon)，即是说当地的曼达林”。另外，二人曾应张献忠之邀观看正月十五烟火节，于是记录了成都地区的烟花技术：“(这个装置) 是一株覆盖着红葡萄藤的树，它的各个连接部分一直在放光，而在另一边，葡萄藤的干、枝、叶及葡萄的光亮逐渐熄灭。然而不仅如此，你还可以辨别葡萄串的红色、树叶的青葱、藤干的褐色、栩栩如生，以至你会坚信那是天然的东西而非仿造。”<sup>①</sup>事实上，传教士除了个人书信及著作中记载成都及四川，也常常将四川的情况以年报的形式报告给教廷，后来 18 世纪巴黎外方传教会主管四川教务时，亦是如此。这些教务报告及档案虽然其中大部分是在阐述传教事业，但其中关于成都地区社会及文化的内容则在他们实际调查基础之上，体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知识性及丰富性特点。

另外，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蜀的西人对成都的研究，则是在继承传教士汉学的知识性与丰富性基础之上，开始逐渐呈现现代学科特点。他们不仅在成都设立医院、学校、博物院及研究机构等，还创办了专门的杂志，用以刊登最新的四川研究成果，如《华西教会新闻》(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华西边疆; 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等。彼时研究四川及成都的人员不再局限于传教士，还有商人及探险家。如 Little, Archid J 的《四川及长江峡谷小记》(Notes on Szechuen and the Yangtze Valley), Watson, W. C. Haines 的《松潘行纪》(Journey to Sungp' an) 和 Shields, E. T 的《华西圣山峨眉山》(Omei San: The Sacred Mountain of West China), 他们在游历四川时，对四川及成都进行了田野调查及考察，其中夹杂了成都的地理地貌及风土民情的描写。<sup>2</sup>而传教士群体则逐渐进入专业汉学领域，如葛维汉 (David Crockett Graham, 1884-1961) 对四川少数民族的考察，叶长青 (Edgar, J. Huston, 1872-1936) 对四川宗教文化的研究，陶然士 (Torrance Thomas, 1871-1958) 的羌族认知，斐焕章 (Joshua Vale) 对成都平原灌溉系统的分析等，无一不彰显他们专业的学术背景，他们将社会学、博物学、人类学甚至经济学引入四川及成都地区研究，他们的田野调查不仅奠定了华西边疆研究的学术及资料基础，更是带给西方更为专业及多层次的成都形象。

---

**作者简介** 胡文铨，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四川成都 610071。

(意) 马克·波罗著：《马可·波罗游记》，李季译，上海：上海东亚图书馆，1936 年，第 186 页。

(意) 马克·波罗：《马可·波罗游记》，李季译，第 187 页。

郭栋臣：《真福和德里传》，现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编号为 Borg.Cin, 326.f.087.f.088。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曾依据历史分期及不同阶段的汉学发展特点，将西方汉学史分为“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专业汉学时期”，见张西平：《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 年，第 3 页。

<sup>2</sup>译自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类思 (Ludovico Buglio, 1606-1682) 手稿，藏于巴勒莫图书馆 (Biblioteca Nazionale di Palermo), iv. E. LIV-LV, pag 60-62。

(葡) 安文思，(意) 利类思，(荷) 许理和：《中国新史》(外两种)，何高济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6 年，第 36 页。

(葡) 安文思，(意) 利类思，(荷) 许理和：《中国新史》(外两种)，何高济译，第 72 页。

关于巴黎卜方教会的档案，可以参看档案学家 Adrien Launay 的相关著作，如 Histoire de 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Vannes : Impr. Lafolye, 1916; Histoire de Se-Tchouan., Paris : T6qui, 1920. 2 vol. : XXI 等。

王蓝：《英国在近代华西考察活动初探》，北京外国语大学硕士论文，2017 年，第 4—6 页。

---

## 二、西方汉学史中成都形象的当代构建

如果说早期记录或描述成都的群体或旅行家或传教士或商人，还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家，但不可否认他们对成都的描述及研究已逐渐呈现出专业的态势，为后来专业汉学的研究奠定了史料及理论基础。而在前人研究之上，当代汉学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

首先，文化史视域中的成都形象。成都是历史悠久的巴蜀文化中心，它所代表的古蜀文化之于中华文明起源及内涵有着重要意义。而成都及四川在这一文化史地位的确定得益于三星堆的考古及研究。自 20 世纪 30 年代至今，三星堆的不断涌现的新材料帮助学界不断地挖掘古蜀文化的脉络，不仅否定了“蜀无礼乐，无文字”的旧说，更是引发了巴蜀文明与中华文明关系的大讨论，考古的发现与成果不断扩充蜀地的文化内涵，从而重新构建蜀地历史并重新定位成都的地位。在对三星堆的考古及研究过程中，中国学者承担着主要角色，但同时亦有不少西方汉学家将其列为四川甚至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点。

当代学者在回顾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的学术史时，曾提到 1930 年，美国学者戴谦和(Daniel Sheets Dye)最早撰文《四川古代石器》(Some ancient circles, squa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初次考略、探讨了四川广汉地区发掘的文物，并将之引入西方学界之内。1933 年，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则是从实证出发，其文章《汉州发掘初步报告》(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zhou Excavation)，通过考古实践考察成都平原与古蜀文明之间的关系。当代汉学家在研究三星堆时，则是在继承前人方法如考古学及历史学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并引用中国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于世界范围内展开对古蜀文化的讨论，从而追溯中国史前文明。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应为 Steven F. Sage 的《古代巴蜀与中国之统一、(Ancient Sichuan and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他立足考古，围绕着蜀地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开始从三星堆遗址中寻求四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巴蜀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他不仅详细介绍了三星堆的考古发现，还辅以《史记》《华阳国志》等文献来探讨秦汉时期的四川文化，同时论述了巴文化与蜀文化发展及结合的过程，尽管他在探究古蜀文化与中华文化关系时例证不足，但对三星堆文化的介绍及研究仍可为海内外其他学者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在西方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眼中，成都的历史随着蜀地历史的追溯而延长，成都形象开始蒙上了一丝独特的史前文化色彩，其文化内涵和底蕴得以丰富，成都的古蜀文化中心的形象及地位开始在西方树立。

其次，社会史视域中的成都形象。悠久的历史 and 独特的地理孕育出成都灿烂的地域文化，表现出和谐包容的文化气度、开拓创新的文化精神、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等。而在该地域文化的影响之下，其社会文化亦别具一格，成为当代西方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地方社会史领域的代表城市之一。

美国学者司昆仑(Stapleton Kristin)的《文明进程中的成都：中国的城市改革，1895-1937》(Civilizing Chengdu: Chinese Urban Reform, 1895- 1937)将其目光聚焦到成都的城市改革上面，从而以小窥大，来探究中国社会在 20 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剧烈变化。在其叙述中，成都的城市改革包括 1900 年代的“新政”及 1920 年代的“市政”，有具体的警察制度、修建道路、推动文教活动等，并且通过与上海、北京等城市的改革活动相对比，突出了内陆城市改革的特点。司昆仑在论证过程中，不时援引中外史料，补充了西方学界在研究中国城市史尤其是城市改革史过程中，对内陆城市的忽略。她将彼时成都的地理及行政架构介绍到西方，同时通过改革过程中的民情及社会变化亦勾勒了成都在 20 世纪初的变化轨道。此外，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深及中外学界互动的频繁，愈来愈多的中国学者在海外治学过程中成为介绍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主力。这批学者均接受过中外学术的系统训练，其成果多为外文，可以直接与西方学界对话。而在成都形象的海外研究及构建上，尤其是社会学领域，中国学者王迪的著作尤为重要。王迪为成都本地学者，赴美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基于对成都历史的熟悉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考量，他先后创作了《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的微观世界(1900-1950)》(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sup>3</sup>和《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

<sup>3</sup>段渝：《三星堆与巴蜀文化研究七十年》，《中华文化论坛》2003 年第 3 期。

Daniel Sheets Dye, “Some ancient circles, squa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 Journal

---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 后者更是获得 2005 年“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这两本著作均是从微观着手, 却展现出不同时期成都公共生活的宏观历史。他充分运用了大量档案、史料、田野调查笔记、口述实录等, 展现出成都这座城市独特的社会及文化, 成为西方人研究及了解成都历史文化的必备书目。

西方汉学家在研究成都社会史时, 还常常关注移民历史。如 Robert Entenmann 的《四川及清代移民政策》(Sichuan and Qing Migration Policy), 从历史学框架分析明了清时期四川的移民背景及发展状况, 并将其与明清鼎革时期的社会变革结合起来。James Lee 的《中国西南地区移民的遗留问题》(The Legacy of Immigr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1250-1840) 相较前者则视域更广, 不论是空间维度还是时间长度。他梳理了中国西南地区的移民历史, 并对移民群体进行了深入探究, 包括其语言、风俗的适应与融人情况。这两位学者的研究, 是对四川乃至成都的一个侧面的深入挖掘, 对成都地区人口的构成及流动, 以及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后, 经济史视域中的成都。在 20 世纪初, 传教士汉学家就已对四川地区的经济展开了研究, 其关注的重点为四川的盐业。罗士恒(Rosthorn Arthur, 1862-1945)曾撰写《四川盐务管理》(The Salt Administration of Ssuch'uan)来介绍四川的盐税管理制度, 他全面考察了四川盐业生产及管理过程中的数据, 并对“官督商销”和“官运官销”的盐税政策进行了具体分析, 该著作彰显了西人对于四川经济产业的研究兴趣, 并为四川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颖的西人史料及视角。当代西方汉学家中仍不乏四川盐业的研究者。Richard Von Glahn 的《宋代四川边界的扩张、安置与文明进程》(The Country of Streams and Grottoes: Expansion, Settlement, and the Civilizing of the Sichuan Frontier in Song times), 该作将四川及成都置于宋代时期, 目光集中在泸州地区。作者运用了丰富的原始文献, 描述了宋朝的扩张及泸州地区的发展 其中便涉及到泸州的制盐业, 他从产业发展角度探讨制盐业与泸州政治、经济的关系。另外美国学者 Madeleine Zelin 在其著作《自贡商人: 中国现代化早期中的企业精神》(The Merchants of Zigong: 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 in Early Modern China), 亦曾谈及四川盐业的管理及生产过程, 作者将其研究地区集中在自贡, 并以一名盐商 Wang Lanyun 作为个案, 分析清朝的盐税制度之于四川盐业的影响。<sup>4</sup>二者都是从个案出发, 并将经济史、政治史及地方史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 虽然未有成都的专章描写, 但对于四川地区整个经济史及制盐业传统进行了介绍, 帮助人们了解到四川具体的经济活动。

当前, 已经译介到我国的西方汉学家关于四川经济史研究的著作作为德国学者艾约博(Jacob Eyferth)的《以竹为生: 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 20 世纪社会史》(Eating Rice from Bamboo Roots: The Social History of a Community of Handicraft Papermakers in Rural Sichuan, 1920-2000)。该书曾获得 2011 年度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的“列文森奖”艾约博在该书中不仅

---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4(1930-1), p. 97-105.

David Crockett Graham,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s,"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 1933, p. 114-131.

Steven F. Sage, Ancient Sichuan and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何一民:《成都历史文化特质简论》,《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3卷第4期,2012年,第121页。

Kristin Stapleton, Civilizing Chengdu: Chinese Urban Reform, 1895-1937,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

Di Wang, 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sup>4</sup>Di Wang, 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Robert Entenmann, "Sichuan and Qing Migration Policy," Ch'ing-shih wen-t'i,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Volume 4, Number 4, December 1980, p. 35-54.

James Lee, The Legacy of Immigr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1250-1850, Annales de D'Études Historiques, 1982, p. 279-304.

Rosthorn Arthur, "The Salt Administration of Ssuch'uan,"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58-1948), 1892, p. 11-16.

Richard Von Glahn, The Country of Streams and Grottoes: Expansion, Settlement, and the Civilizing of the Sichuan Frontier in Song tim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Madeleine Zelin, The Merchants of Zigong: 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 in Early Moder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将四川的经济史从明清时期转到 20 世纪，亦将传统研究的聚焦点由盐业转到造纸业。他将四川夹江的造纸业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翔实的田野调查，还原了传统手工造纸的步骤及方法，并对这一手工业关联出来的十分独特的社会关系及社会方式展开了深入探讨。这种生产模式塑造出了特色的地区文化，但同时在社会发展及机械制造冲击之下，夹江的社会形势也发生了新的改变，而这同时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发生的变革。该著作运用了社会学及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立足田野调查对夹江的经济及社会变迁进行了梳理，虽未深入开展其背后的产生因素，但仍以其角度和材料带动了四川经济史乃至中国经济史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成都经济发展迅速，作为西部经济中心开始崛起，愈来愈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关注成都的发展模式及经济的现代化，一批时事性很强的研究成果开始出现。D. J. Dwyer 的《四川成都：一个中国城市的现代化》(Chengdu, Sichuan: the Modernisation of a Chinese City)，立足于丰富的实地调查数据及历史资料，整体描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成都的发展状况，并与 Hubbard 在 1923 年对成都的研究进行了对比，更为立体地展现出成都经济发展及社会文化的变迁。

### 三、西方汉学视野中成都形象的特点与文化嬗变

因汉学(Sinology)的诞生与全球化密不可分，故其发展轨迹几乎与中外文化交流历程相吻合。汉学研究体现更多的是“交流是文化发展的本质和必然”，从最开始的好奇使然、只言片语，到后来的实地探访、专业研究，汉学从单纯的知识介绍嬗变为有意识的学科研究。西方人对中国知识的介绍与研究，一方面是为了依托遥远的东方形象要构建乃至回应自己的“乌托邦”，一方面则是可以为中国本土学者创造了基于开放视角结构本土学问的机会。具体到成都研究，分析西方人视野中的成都，对其不同阶段的形象特点进行归纳总结，有助于了解成都在西方汉学史上的文化嬗变。同时，汉学家所记所述的成都，也可以为本土研究提供一定的材料来源及思考角度。

从 14 世纪游记中的成都形象到当代汉学家笔下的成都形象，不难发现，西方汉学视域中的成都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研究视域逐渐扩大。在游记汉学时期，西方旅行者对成都的记录与观察多停留在表面的简单叙述，并将想象与事实揉杂在一起。因为游记本身的存在即是以隐喻的方式表现出内在在精神生活的深入过程，西方旅行者在探索东方的同时，亦是在探索自我。他们对元朝时期繁荣的天府之国青睐有加，对其地理景观、风俗人情充满了溢美之词，他们习惯“将熟悉的祖国的概念作为画布来描绘外国的形象”，表达的则是对自身文化的转喻及期望。<sup>5</sup>因此，西方人在游记中记载并构建成都形象，充满了异域乌托邦的色彩，却又严密契合了欧洲主流的文化思想框架。这种乌托邦式的描述一直延续到传教士汉学晚期。自 17 世纪，西方传教士入蜀，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他们入蜀的主观目的是为了传教。不同于旅游者，他们均掌握了汉语并谙熟中国经典，因此他们在成都生活期间，可以更好地去观察和记录成都。虽然他们的记载多是为了传教服务，但由于其本身夹于中西文化之间，他们对成都形象的构建体现出强烈的文化对话意识，具有跨文化研究特质。到了 20 世纪初，西方传教士除在成都传教之外，还设立医院、大学等，开始主动地将成都及四川研究视之为学术兴趣。他们笔下的成都，少了游记的想象，多了知识性的记述，成都于他们而言，不再是想象的乌托邦，亦不局限于福音的传播地，他们将自己传教技能之外的知识运用在对这片土地的观察及研究上，对成都的研究视域逐渐扩大。他们所留下的材料成为专业汉学的基础，继续推进当代汉学家的研究。当代汉学家则更倾向于将成都视为中国研究中的重要个案研究，他们的研究视域横跨古今，将成都置于中国历史研究及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范畴之内，既充分挖掘史料对历史中的成都进行研究，又依赖于实地调研及学术方法对当下的成都进行分析及阐述。如果说，游记帮助西方勾勒了元代成都的轮廓，绚丽且模糊，随后明清时期的传教士的记录则是在轮廓之中添加了血肉，全面展现了彼时成都的真实，而当代汉学家对于成都形象构建的意义则在于打通了历史与当代的隔阂，使得成都形象更为立体。

<sup>5</sup>参看【德】艾约博著，韩巍译：《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 20 世纪社会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年。  
D. J. Dwyer, Chengdu, Sichuan: The Modernisation of a Chinese City, Geography, vol. 71, No. 3 (June 1986), p. 215 - 227.

这里 1923 年的数据指的是 George D Hubbard, The 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tu, Oberlin, 1923.  
田俊武，陈玉华：《东方乌托邦——欧洲中世纪旅行文学中的北京形象》，《外国语文》2018 年第 1 期。

---

第二，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视域的扩大必然会扩充研究内容。游记时代的成都研究，内容涉及到成都的地理位置、山川河流、房屋建筑及植物特产，囿于观察者的逗留时间及知识水平，他们仅是粗略记录，另外，游记多写于他们返回欧洲之后，仅凭记忆对其进行勾勒，因此内容更增加了不确定性及虚构的成分。传教士汉学时代的成都研究，因为研究者已具备了与本土文化进行对话及反思的能力，故而他们的研究内容丰富，涉及到四川的宗教、政治体制、风俗习惯、民族、方言等，他们多依靠实际的田野调查，内容的真实性及丰富性都要远超前者。迨及当代研究，则是在传教士汉学丰富内容的基础上，研究地更为深入，并紧随时代特点，呈现出成都研究的时代性和实时性，如对三星堆及成都当代经济的研究，多建立在翔实的资料和数据的基础之上，但鉴于西方汉学研究终归为西方学术研究的组成部分，故西方学者对成都的研究仍是将成都地方研究置于西方学术理论之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客观性及本土性。

第三，研究方法呈现出跨学科交叉特点。西方汉学视野中的成都研究是属于中国形象海外构建的一部分，如果说游记汉学尚未有系统的研究方法，那么传教士汉学则开始出现研究方法的雏形，虽内容与教会史研究联系密切，但逐渐出现了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等研究意识，他们开始利用某一研究方法挖掘成都的历史及文化，还经常将其综合运用到某一领域，促使成都研究走向学科性及专业性，同时他们创立的研究学派则影响到后来的成都研究，既为本土学者提供视角及史料，也为海外学者提供研究的基础及范本。当代的成都研究则是在传统研究方法之外，与时俱进，引入了一些新理论及新方法，如口述历史、建模定量、女性主义等，呈现从多重维度分析研究对象的特点。

第四，研究群体的多样化。既为西方汉学界对成都的研究，那么研究群体一般为西人，如西方的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探险家等，在专业汉学之前，这一研究群体的身份特征时有交叉，比如 19 世纪末 20 世纪在蜀的西人大部分是传教士，但他们同时也是大学教授、博物馆馆长、医生等。而在早期游记汉学及传教士汉学时期，鲜有中国人在成都形象构建过程中发声，一方面是囿于语言，不通外文，难以直 t 妾与西方学界对话；另一方面，则是在中外爸作过程中，中国人多以助手身份参与，留下的著作难以考定。但随着新时期愈来愈多的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由他们撰写的关于成都研究的外文著作，开始成为西方学者或参考或借鉴的对象。故而，这批学者在研究西方汉学对成都形象的构建时，也必须纳入考虑范围之内。

## 结语

综上，成都形象在西方汉学史中的构建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内涵及特征。整体而言，西方人构建的成都形象越来越丰满，也越来越贴近真实，他们的成都研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随着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成都研究的视域、内容、方法及群体亦愈来愈丰富，但其中还应注意，他们仍未完全摆脱西方学术理论及框架，多沿袭西方传统方法并引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交流的互动性以及形象构建的真实性。而这方面，也正是本土学者应该努力的方向，既要展开对西方学者成都研究的再研究，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鉴别分析，充分挖掘其中的史料价值及思想角度，从而关注到本土研究中长期受到忽略甚至薄弱的环节，另外，则要加强与西方学界的合作，积极推动成都地区文化的走出去，鼓励中国学者在国际范围内发声，并通过合作，与西方汉学家优势互补，从而尽量消除异质文化交流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误区，助力成都形象在海外的构建。